

中国历史上那些珍贵的典籍能够逃过秦火和战火而传承下来，除了要感谢孔鲋、伏生等冒着生命危险把典籍藏起来、传下来的爱书之人，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作为汉高祖刘邦的得力助手，萧何为保护古代典籍、传承中华文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并没有烧毁所有书籍，他主要烧的是各国史记和诗、书、百家语等。那些医药、算书、种植方面的书以及一些技术类的书并不在焚烧之列。毕竟秦始皇也明白这些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比如秦直道是如何测绘修建的？秦郑国渠和灵渠是如何测绘与修建的？那些锋利无比的青铜利剑、威力无比的强弓硬弩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秦始皇兵马俑是如何烧制的？等等。应该说，这些重大的工程和先进的工艺，当时是一定会有些记载的，秦始皇想让自己的王朝千秋万世，就必定会让那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记录下来为后世所学所用。但是，这些今天看来都是十分伟大的科学技术和建筑、艺术成就，我们却并不清楚古人是如何实现的，很有可能记载这些技术的书籍被攻入咸阳的项羽一把火烧掉了。

万幸的是，在项羽进入关中之前，刘邦是先行攻入咸阳的。当刘邦的部下都在忙着抢夺金银财宝的时候，萧何却做了一件对中华民族居功至伟的事情。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而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说刘邦率军进入咸阳的时候，将领们都争先奔向储藏金帛财物的仓库去分东西，唯独萧何直奔秦朝丞相府和御史府，把保管

萧何与汉代皇家图书馆

□ 舒 嫒

在那里的法律诏令以及各种图书文献收藏起来。为什么萧何直奔丞相府和御史府？因为萧何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当过“卒史”，管理过文书档案，通晓律令，还跟当时下基层的御史很熟，所以他知道，除了石室金匱和密室，丞相府和御史府也是秦朝重要的藏书机构，而且收藏的是和国家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户口、地图等重要的文献档案和图书资料。

萧何的行动对刘邦赢得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如《史记》所言：“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刘邦后来之所以能详细地知道全国各处的险关要塞、户口多少、兵力强弱和百姓的疾苦，都是因为萧何完整地得到了秦朝重要的图书档案地图等文献资料。同时也为日后西汉政府确立恰当的治国方略和律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萧何的行动对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因为他第一时间将秦朝中央图书馆里的重要藏书收集保护起来，这些书后来在萧何的妥善安排下成为汉朝中央政府的藏书。萧何保存的那部分珍贵典籍，躲过了被项羽烧掉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中

华民族文化史和藏书史上的一大幸事。那么，萧何是如何妥善安排这些图书典籍的呢？

现在回头看，萧何的藏书理念和对汉代国家图书馆的设计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在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都长安的时候，当时的长安一片破败，又因为天下刚定，各地的反叛势力还在不断地搞事情，刘邦还需要亲自带兵平叛，于是设计和修建宫殿的任务就落到了丞相萧何的头上。萧何一点不含糊，给刘邦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宫——未央宫。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总面积大约有北京紫禁城的6倍之大。当然，对读书人来说，面积大不是最大的亮点，而是萧何在未央宫建造了3座用于藏书的楼阁，为大汉朝的国家图书馆留出了宽敞的藏书之地。

一个叫石渠阁，位于未央宫的西北部，收藏了刘邦攻进咸阳后萧何所收集的秦朝的图籍档案。之所以叫石渠阁，是因为建筑特点得名，在阁的周围用磨制的石块筑成水渠，渠中导入流水围绕在阁的四周，这对于防火十分有利。藏书就怕失火，而石渠阁的设计使得这里一旦发生火灾，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取水来灭火。后世很

多藏书楼都受此启发，比如著名的天一阁前面就设计了一个天一湖，用来方便防火取水。由于石渠阁中有大量藏书和资料，许多著名文人学士都到这里查阅各种文献。渐渐的，石渠阁又成了首都的学术中心，学者们在这里参加皇室或中央政府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他们谈古论今、说天道地，历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就发生在这里。当时由汉宣帝亲自主持会议，全国的儒学大师云集石渠阁，共同研究讨论儒学经典“六经”之异同。一时间石渠阁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使得这次会议成为当时文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盛况空前的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其影响力正如《后汉书·翟酺传》所载：“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石渠阁在读书人心中的地位也如同元代诗人刘性所写的那样——“斯石渠之为阁，彰万代之斯文”。

萧何主持营建的另一个著名的藏书地点叫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北部，与石渠阁东西相望。天禄阁得名于天禄，天禄就是天鹿的谐音，汉代人们认为天鹿是一种象征祥瑞的神兽。天禄阁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班固《西都赋》有记：“天禄

石渠，典籍之府。”石渠阁、天禄阁既是汉代的中央档案库，也是皇家图书馆，还是群儒校勘经籍从事著述的处所。到了西汉末年，长安成为全国收藏图书档案最多的地方，“石渠阁”和“天禄阁”成为当时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规模最大、藏书数量最多、书籍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因此后人回望汉朝，“石渠阁”和“天禄阁”便成了皇家图书馆的代名词。比如清朝乾隆帝就把当时皇宫典藏书画的著录之书命名为《石渠宝笈》；给自己藏书的地点乾清宫“昭仁殿”，亲自书写了一块叫“天禄琳琅”的匾额挂上去。甚至连后世孩子们背的《声律启蒙》里都有这样的句子：“六朝对三国，天禄对石渠。”可见这两阁的影响力有多大。

萧何主持营建的第三个著名的藏书地点叫麒麟阁，也叫麟阁。据《三辅黄图·阁》所载：“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所谓秘书，即官禁秘藏之书。所以，这麒麟阁也是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分。到汉宣帝的时候，皇帝“思股肱之美”，想到那些股肱大臣的功劳，为了表彰他们，就画了霍光、苏武等11位功勋卓著的大臣的画像挂在麒麟阁，“是以表

而扬之”，以表扬其功绩，“表扬”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中国古代图写功臣的画像制度也是从此开始的。后世多以“麒麟阁”或“麟阁”表示卓越的功勋和最高的荣誉。后来唐代的“凌烟阁”、清代的“紫光阁”收藏功臣画像，也都是跟“麒麟阁”学的。此后“麒麟阁”也经常出现诗人的诗句当中，比如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中的“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高适《塞下曲》中的“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可见麒麟阁和石渠阁、天禄阁比起来名气一点也不差。

萧何主持设计和营建的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这3个藏书阁是西汉王朝中央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汉代及其以后各朝代皇家图书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汉武帝不断向民间征集图书，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图书已经“积如丘山”，这3个阁已经放不下这么多图书了，所以后来又增加了兰台、延阁、广内等多个藏书的地方。藏书的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当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景象。大汉臣臣对藏书的重视和保护也为传承历史文脉、保护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遗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影响巨大。



《满洲源流考》与清朝的历史书写

□ 李金飞

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论述清代史学的重要地位时，曾指出：“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也正是清朝这种完善而又连续不间断的修史系统才把中国传统的官方修史事业推至顶峰。有清一代，官方史学成为整个史学画卷中浓重的一笔。官方修史所具有的独特性在于皆由帝王以及朝廷主导，因此，整个编纂活动不可能游离于朝廷政治之外，每一史馆的开设及史书的纂修，均与当时国家的政治、边疆、民族等问题息息相关。其中，乾隆朝成书的《满洲源流考》是清帝及其群臣为“本族”所修的史著，从民族起源上论证了清朝得天下的正当性，从政治上体现了清朝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正统性”追求。

为正统资格立论

清朝以少数民族满洲身份入主中原，自“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后，经过几代帝王的悉心经营，建立起空前辽阔的“大一统”疆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最终形成。然而，清朝却始终面临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那就是其自身的“夷狄”身份备受汉族士大夫排斥，特别是

汉族士大夫渲染的“夷狄不得为正统”，始终萦绕在满洲统治者的心头。

中国历代王朝在政权建立伊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立起“正统性”。所谓“正统”，即为“继前统，授新命”，也就是新旧两个政权的更替问题。对于清朝而言，就是如何实现对明朝的合法性继承。自入关后，清朝始终在竭尽全力调用各种资源为其“正统”资格立论，其中，利用文本建构对其少数民族身份进行合法性历史书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清朝崇儒重道，推行文治。在此国策指导下，开启了诸多大规模的史书文本编纂活动，寄予了统治者浓厚的政治思考。盛清时期，在实现国家“大一统”之后，乾隆帝依托其引以为傲的史馆修史，开始了“开国史”系列史书的撰写，力图从民族起源上来解决长期以来极为头疼的“正统”难题。《满洲源流考》成为整个乾隆朝盛世修史中一部极具特色的史书，是由乾隆帝亲自主导，史官群体共同协作完成。与其他诸史一样，《满洲源流考》绝非单纯的学术文化活动，而是清朝对于其民族身份“正统性”确立的历史书写，以重塑有利于其合法统治的新记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乾隆帝发布上谕，宣布该书开始编纂。对于这样一部关于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史书，乾隆帝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他将该书交给当时运转流畅的常设史馆方略馆负责。在史官选拔上，乾隆帝甚至同时任命了以阿桂、于敏中、和珅、董诰四位大学士为代表的诸多朝廷重臣。此后，又迅速完善了相关官职职掌的人员配置：郎中巴尼辉，侍读孙永清为提调官，专司督催稽核；内閣侍读麟喜，中书呈麟，笔帖式七德为满纂修官；翰林院编修宋琬、平恕，补部员曹锡宝为汉纂修官；理藩院笔帖式临保，补笔帖式明伦，工部库使巴尼泰为译汉官；而誊录、供事等都在方略馆中调取。这也是清朝惯用的史书编纂分工合作模式，是为能够各尽职责，有效完成。

开馆之初，方略馆针对《满洲源流考》一书的编纂，共拟订七条“凡例”，传达了该书的编纂思想，规定了编纂原则和方法。乾隆帝亲自为该书定名为《满洲源流考》，虽然仅有20卷，但从整个编纂过程来看却是持续较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完成汉文本，此后，又继续进行满文本的摹写。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所有文本校改完毕，送至武英殿刊刻。

立体的满洲

《满洲源流考》是清朝为自己

“先世”所撰之书，因此，在刻画满洲形象上可谓是不遗余力。该书首先对满洲一词的内涵进行诠释，特别强调满洲是一个部落名称，而非地名，“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在清朝的“国语”满文中，满洲的表述是为“满珠”，被译为汉文后，方为满洲。应当承认，仅就“洲”字而言，似乎更像是一个地名的表达，为不致有歧义，乾隆帝特意对该字的使用称之为“假借用之”。《满洲源流考》就是以满洲为核心，紧紧围绕历史渊源、发展演变等相关问题展开历史的考察。

从全书布局来看，《满洲源流考》共分为四门：部族、疆域、山川、国俗。“部族”为首，以时间顺序先后论及肃慎、夫余、挹娄、三韩、勿吉、百济、新罗、靺鞨、渤海、完颜、建州等。而“疆域”一门卷帙最多，所占篇幅也最大，仅在目录中就选取了200多个地点，以全面展现满族及其先世各族生活的疆域范围。“山川”所指的是“凡白山黑水诸名胜，悉皆采列”，包括山、岭、冈、崖、峪、岛、江、河、水、泊等80多处，最后附以“弱水诸水”。“国俗”则是对满洲的风俗习惯包括骑射、冠服、政教、祭祀、祭天、祭神、祭礼、官制、语言、物产、杂级等进行了系统阐述。这四大门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在内容上形成了相互交叉与配合的特征，从不同视角展开对满洲的全面立体书写。

《满洲源流考》一书的写作方法也极具特色。在每门的开篇都是先有“按语”与“说明”，然后再论及正文，且正文之下又采用小字进行详细诠释，从而使得文本内容的表达更为细腻与丰满。当然，该书既是要对满洲进行历史考证，因此，从文本所用文献资料来看，可谓是包罗万象、囊括古今，“博采诸书，以广参稽”。仅就以往官修前代正史来看，几乎是均有涉及，而又以《金史》引用最多最频，其他各类史书也被广泛采纳。

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表达

《满洲源流考》在对中国一脉相承的历史演变中，寻找到满洲曾经有过的真实性历史存在，以此证明满洲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续统，“在古为肃慎，在汉为三韩，在魏晋为挹娄，在元魏为勿吉，在隋唐为靺鞨、新罗、渤海、百济诸国，在金初为完颜部”。因此，满洲人并非外来民族，自始至终就是土生土长、扎根中国大地的一员，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论证的言外之意已经极为明确，那就是满洲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拥有君临天下的资格。

清朝显然是在论证满洲拥有“正统”资格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特别是有意与历史上曾经建立金朝的完颜女真在同根同源上进行刻画与书写。如二者发源地为“白山黑水”，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黑龙江，“本朝肇兴东土，山川毓毓与大金正同”。再如二者姓氏相同，“我朝得姓曰‘爱新觉罗氏’，国语谓‘金’”。也就是有着“金源同派”的血缘关联。其蕴含之意，就是满洲完全可以同金朝一样成为统治者。此外，同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惯用的神话渲染方式相似，清朝也以“三仙女”“佛库伦吞朱果”等故事给满洲披上了君权神授外衣，“我朝自白山天作，朱果灵彰，年祀绵长”，为其“正统”性进一步保驾护航。

《满洲源流考》还专门从满洲活动的疆域上“正统”资格进行详细考证，这实际上是贯穿当时乾隆帝倡导的“有疆域可凭即为‘正统’”的理念。因此，该书极力表达满洲拥有自己独立的疆域，“明初，疆域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全属我朝，及国初，乌拉、哈达、叶赫、辉发诸国，并长白山之讷殷，东海之窝集等部”。特别是要极力证明，其疆域与明朝之间是为相互独立，因此，作出了“明人曾未涉其境”的话语表达。这显然是不想让满洲的起兵及对明战争背负着以下乱上的罪名。

当然，满洲曾经臣属于明朝是无法否认的史实。清朝很显然是在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该书在过度渲染满洲“独立性”特征的同时，又极力避免篡改历史的嫌疑，因此该书又在毫不避讳地书写满洲曾经臣属于明朝的诸多历史史实，如标注出永乐年间，明朝在满洲居住地曾经建立过的400多个卫所。然而，该书很快又对此作出解释，指出这种曾经的臣属关系并不会影响满洲所拥有的立国资格，“我朝在大金时，未尝不完颜氏之服属，犹之完颜氏在今日，皆为我朝之臣仆，普天率土统于一尊，理固如斯”。该书还一再强调，历史上的金朝如同汉、唐、宋、明等一样，都曾“是胜国之臣仆”，但是，却毫不影响他们成为统治者。

综上，在乾隆朝纂修的这部清朝民族史《满洲源流考》，是乾隆帝及其群臣论述清朝“得国之正”的产物。因此，该书绝非是一部单纯的学术史料，也是清朝建构其政治文化的重要表达。



（上接1版）

走出一条超大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子,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紧扣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找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突破口，让新质生产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突出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点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紧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重构科教人才新优势。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强市、教育强市、人才强市建设，发挥国家实验室等大国重器作用，建好用好大科学装置，加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建设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地，引育更多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共建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重构产业发展新优势。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结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加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壮大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稳步、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构建先进制造业集群。落实“人工智能+”行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好做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重构基础设施新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强化基础设施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承载作用。适应科技创新范式变革、模式重构的新需求，加速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智能算力、6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突出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注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传承千年商都的开放基因，以归零重启心态“杀出一条血路”，让各类先进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以南沙开发开放为重点增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在落实政策、提升规划、港澳合作、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服务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

位。以营商环境改革为牵引强化集成式改革创新。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主动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信心、排忧解难，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招商引资引技引智体制等领域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以打好“五外联动”组合拳为抓手推进引领性开放。发挥国家综合性门户城市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在外贸、外资、外包、外经、外智上加强协同联动，着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国际商贸中心提质升级。

突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持续擦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鲜明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升绿色发展“含新量”。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培育壮大先进环保装备制造、现代环境服务等领域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推动构建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提升生活方式“含绿量”。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推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水节电等成风成俗。提升绿美建设“含金量”。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共建华南国家植物园为牵引，高水平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样板，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突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据城乡资源禀赋、特色优势，深入挖掘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设空间、资源空间、市场空间、承载力空间。全方位优化空间布局。落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促进千年城脉、文脉、血脉传承发展，老中轴、新中轴、活力创新轴融合互动，历史文化核、现代活力核、未来发展核联动发展，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打造城市新形态。高水平促进城乡区域发展。全面实施城市品质提升计划，推动城中村改造取得更大实质性突破，实现产业形态优化、居住环境改善、城市文明跃升。深层次推进区域合作。深入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进一步增加经济纵深，努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塑造优势。

（作者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